

三块手表

□ 陈毅林

又要搬家了,家里的老物件都要清理。虽然搬进新家,房子更宽敞了,但我总还是割舍不掉这些颇具历史记忆的老物件。在老伴的再三催促下,我便逐一对那些老东西进行清理。

在收拾一张旧桌子时,打开抽屉,里面整齐摆放着见证我工作和成长经历的笔记本,翻开这一本本笔记,泛黄的纸张上记载着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”,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‘东方红’上天”,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……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充满激情的记忆,有辉煌,有激动,但有时也充满疯狂。翻开笔记本,瞥见有3块手表躺在一个小角落,表针已不能动了,但擦拭一遍后还是光亮如新。看到这一幕,我顿时一怔,“哦,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”,这3块手表将我的记忆又带回那个年代……

躺在最里面的手表是广州生产的羊城牌手表。说起这块表,还颇有一些来历。当时在我看来,工作以后能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,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象征了。钢笔用来记录成长,而手表用来计时。因此我急切地想买一块手表。但那时候家里很穷,而手表的价格又比较高,因此手表对我来讲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。因为那时一个月只有38块钱的工资,而一块羊城牌手表却要52元,基本上是我两个月的工资。当时我手头的钱加起来只有28块钱,只能买半块手表。第二个月发工资后,除去生活费和其他开销还剩50块钱,我本打算把那块羊城牌手表买下,但没想到大哥突然生病,每天一支青霉素,打了半个月,一下花了30块钱,买表的计划又泡汤了。直到1975年的春天,我终于如愿以偿买了一块羊城牌手



表,这块手表我一直戴了3年。

躺在中间的是块上海牌手表。我的羊城牌手表着实让同事们挺羡慕了一阵,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也都戴上了手表,而且都是清一色上海牌的。一天,同事老朱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伙计,现在谁还戴羊城牌手表,都改戴上海表了。上海是老商业中心,地方大,牌子也硬,质量更是无可挑剔。你看我这表自打买下就没错过。”听完这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感觉自己已经落伍了。“不能丢份。”我心想。于是我咬咬牙也买了一块上海表。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58块钱,而一块上海表要52元钱,因此没有费多大的劲。这上海表果真和老朱说的一样,质量很好。

后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国外产品大量涌入,走在最前面的便是日本生产的。日本生产的产品不仅质量好,外形也美观,基于这个考虑,我又买了一块100多元钱的西铁城手表。那时我的月工资是100多元钱。但这块手表没有跟我太久便“下岗”了。因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,BP机风靡一时,我紧跟潮流弄了一个,BP机兼有通讯和计时的功能,手表的作用也就没那么明显了,而且手表戴起来也的确不方便。再到后来,手机开始进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,手机功能更为齐全,手表作为计时工具已没有了原先的风光。

看着这三块早已不能工作的手表,我思考了很多。从热衷于买手表,戴手表,到今天的不戴手表,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吗?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普通见证者,我只想说一句话: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!”

(责编 卫清萍)